

李 琴 著

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关系研究

The Interplay between Chinese Translated Literature and Native Literature

李 琴 著

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关系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关系研究/李琴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9

ISBN 978 - 7 - 5161 - 3274 - 6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翻译—文学史
—研究 IV. ①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408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陈肖静

责任编辑 陈肖静

责任校对 刘娟

责任印制 戴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4.75

插 页 2

字 数 226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中国翻译文学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的佛典翻译。中国翻译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本土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进行着频繁而复杂的互动交流，在对本土文学形成重大影响的同时，自身也在不断地完善和进步，近年来更是兴起了对翻译文学本体价值的认知和讨论，翻译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学现象，它的生成机制、存在形态、阅读与传播方式、与原语及译入语文学和文化的关系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本书从翻译学与比较文学两个视角，分文化与文学两个层面，对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得出以下结论：

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首先表现为中国翻译文学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因为文学是文化这一大的多元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外国文学在经由文学翻译活动进入中国后，会面临中国社会文化语境和文学接受语境的选择，契合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审美取向的翻译文学将被接受甚至经典化，进入文学系统的中心，与中国本土文学产生互动交流，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甚至会打破中国本土文学的既成规范，成为中国本土文学创作的模板，与中国本土文学分占半壁江山。相反，违背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审美取向的翻译文学将流入文学系统的边缘。

中国翻译文学的生成离不开文学翻译活动，而中国社会文化，特别是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实践之间也存在着非常重要的互动关系。作为

翻译活动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类型，文学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受译入语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同时也会受到译者个人文化意识形态、文化立场、文化态度和民族文化心理等因素的影响，最终表现为文学翻译策略选择上的不同。在中国文化语境下，文学翻译在不同社会阶段的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往往会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与中国本土文化和文学进行着复杂而有趣的互动交流。

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还表现为文学层面上的互动。中国翻译文学进入中国文化语境后，对中国本土文学产生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自佛典翻译起，中国翻译文学就开始对中国本土文学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学观念、文学主题、文学风格、文学类型等产生影响，进而对整个中国文化产生影响。可以说，中国本土文学和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与中国翻译文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中国文学创作与文学翻译之间的互动也是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互动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非常著名的翻译家兼文学家，例如林纾、鲁迅等，他们在大量进行文学翻译实践的同时，借鉴国外文学在主题、思想、风格等方面的优势，融入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中，互相取长补短，为促进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作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两个子系统，它们的主客体地位时刻处于互动和互相转化的过程中。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本土文学急需引进国外先进的文学思想、文学理念和文学创作方法来丰富和充实本国的文学创作，因此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体系中占据着主体地位，为中国本土文学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和养分；现代中国的本土文学在翻译文学的影响下，在文学语言、文学思想、文学创作手法等方面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在这一发展壮大的过程中，翻译文学持续占据着文学多元系统的主体地位，与本土文学一道经历着发展和成熟。新时期以来，中国本土文学创作显现出较为成熟的走向，重在民族本土文化资源的发掘和利用，翻译文学逐渐丧失了作为典范文学的主体地位，走向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而中国本土文学则逐渐走向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占

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主体地位。

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融合的过程，本书重在建构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架构，而支撑和填充这一架构的“建筑材料”则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地丰富和壮大，并影响着二者之间关系的不断变迁。期待学界众多同仁共同努力，不断推陈出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引言	(1)
第一节 概念界定: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	(3)
第二节 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互动关系的相关理论阐释	(6)
第三节 翻译文学、本土文学与社会文化	(11)
 第一部分 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社会文化的互动	
第二章 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社会文化的互动	(17)
第一节 翻译文学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	(17)
第二节 中国社会文化与翻译文学选材的变迁	(25)
第三节 中国翻译文学与中国本土社会文化的现代化	(53)
第三章 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的互动	(56)
第一节 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的互动关系	(59)
第二节 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翻译中的译述、改译和转译	(68)
第三节 现当代中国文学翻译中的归化、异化之争	(76)
第四节 文学翻译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	(86)

第二部分 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

第四章 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	(92)
第一节 中国本土文学接受语境与翻译文学	(92)
第二节 中国本土文学观对翻译文学主题的选择	(96)
第三节 中国翻译文学与中国本土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128)
第五章 中国文学家兼翻译家的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的互动	(157)
第一节 林纾	(160)
第二节 鲁迅	(180)
第六章 结论	(209)
第一节 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关系	(209)
第二节 对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互动关系研究的再思考	(211)
参考文献	(218)

第一章 引言

中国翻译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本土文学进行着积极的互动交流，这已是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日趋发展成熟，二者之间的交流互动也变得更为频繁、广泛和深入。然而，学界对中国翻译文学的认识和研究似乎还很不充分，翻译文学研究总是处于一个被忽视的状态，更谈不上对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关系的认识和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20多年中，我国迎来了第四次翻译高潮，翻译文学也经历了又一个繁荣，对翻译文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在翻译文学理论研究、翻译文学史研究、翻译文学批评研究、文献整理和理论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84年翻译研究专家罗新璋先生编选的《翻译论集》奠定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译学研究，包括翻译文学研究的基础。80年代后，关于翻译文学的研究论文和专著出现了很多，对我国翻译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文学史研究和翻译文学理论研究方面。翻译文学史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著述有陈玉刚教授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1989年），这是第一部对中国翻译文学史进行独立研究的著作。孙致礼编著的《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1996年）是我国第一部非常重要的中国翻译文学断代史和专题史。郭延礼教授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1998年）是又一部中国翻译文学断代史，在资料积累翔实可靠方面堪称典范。2001年王向远教授出版了《20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这是我国第一部国别文学翻译史，表明了今后我国翻译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趋势。2005年出版的由孟昭毅、李载道编写的《中国翻译文学

史》无论是在思想原则、内容跨度等方面都更为深入和全面。近 20 年来在翻译文学理论研究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首推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谢天振教授，代表性著作有论文集《比较文学与翻译文学》（1994 年）、《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1998 年）；专著《译介学》（1999 年）。王向远教授的《翻译文学导论》（2004 年）也是翻译文学理论研究方面的佳作。另外，杨自俭（《翻译新论》，1994）、许钧（《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2001）、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1999）、刘重德（《文学翻译十讲》，1991）等专家学者也为我国翻译文学，特别是文学翻译理论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然而，目前为止我国翻译文学研究的著作大多是翻译文学史的书写和翻译文学理论研究，还未出现较为系统的研究我国翻译文学和本土社会文化以及文学的互动关系的专门著述。与著作相比，探讨我国翻译文学和本土社会文化以及文学的互动关系的论文则较为丰富，近 20 年来出现了大量相关文章，但大多数文章由于篇幅所限，只能集中探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内我国翻译文学与本土社会文化或者本土文学的互动关系，或是集中探讨文学翻译与本土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或是探讨翻译文学对本土文学创作的影响（例如郭延礼：“近代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近代化”；姜秋霞：“论社会文化对文学翻译的影响”；骆贤凤：“文学翻译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述略”；张俊才：“林纾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张萍：“试论翻译对中国通俗文学形成与发展的影响”；王友贵：“意识形态与 20 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1899—1979）”；王宁：“现代性、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重构”、“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化现代性”，等等），只有少量论文涉及了我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研究（例如陈改玲：“‘五四’翻译文学与小说创作的‘互动’关系”；高玉：“翻译文学：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关系中的中介性”；徐鹏绪、陈霞：“现代中国作家兼翻译家现象研究——翻译文学、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互动关系考察（之一）”；姜秋霞：“翻译文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20 世纪初与 20 世纪末我国翻译文学主题和来源的调查与分析”，等等），但还是未能对我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关系做一较为全面系统的、历时的考察和研究，特别是对我们现在所

处的具有多元文化特征的 21 世纪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情况进行系统深入地探讨，而这些缺憾正是本书致力于弥补的地方和努力的方向。

第一节 概念界定：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

目前中国学界对（中国）翻译文学的界定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谢天振教授在《译介学》中对“中国翻译文学”做了界定，认为“‘（中国）翻译文学’指的是属于艺术范畴的‘汉译外国文学作品’”^①。郭延礼教授也认为，“从科学意义上讲，所谓‘中国翻译文学’应当是指中国人在国内或国外用中文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② 葛中俊教授认为，“对于翻译文学的概念，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1）翻译文学属于文学范畴。（2）翻译文学不可避免地归附于一种语言，这种语言不是原作语言而是译作语言。（3）翻译文学既可是一种作品总集，又可是一种学科门类。作为作品总集，其中的每一部作品必须具备文学价值。任何一部源语的文学作品，若经过译者的翻译过程操作之后变成非文学的东西，必然会被排斥在翻译文学作品的集合之外，而成为作为学科门类的翻译文学研究、批评的研究对象。（4）翻译文学的价值持有者和承担者是翻译者。因为一部源语作品在译入不同的目的语以及经由不同的翻译者译入同一种目的语的时候，译作与原作之间以及不同译本之间往往存在着相当大的价值距离；原作的价值在经过翻译者的劳动之后得到部分的消解并在此新的基础上得到扩大。（5）翻译文学在属性上与外国文学有所分别，与文学翻译则分属不同的范畴”。^③ 王向远教授在把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外国文学等概念进行对比后，认为翻译文学是一个文学类型的概念，翻译文学概念的成立与文学类型的划分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文学类型的

^① 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23 页。

^② 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5 页。

^③ 葛中俊：《翻译文学：目的语文学的次范畴》，《中国比较文学》1997 年第 3 期。

概念，本土文学、翻译文学、外国文学具有相互关联而又独特的内涵与外延。^① 以上学者对于翻译文学的界定，有的是对“翻译文学”做整体上的概括，有的是专门对“中国翻译文学”加以界定，其共同之处是都是在与其他概念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得来的，例如在与本土文学、外国文学、文学翻译等概念的比较中得出对翻译文学概念和性质的界定，这就说明要科学地研究翻译文学，就离不开与其紧密相关的其他文学范畴，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互动关系研究的意义也由此而彰显出来。本书对于中国翻译文学的讨论将以郭延礼教授的“中国人在国内或国外用中文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这一概念为主，因为这一概念从翻译者、翻译语言、翻译内容等方面较为清晰地界定了中国翻译文学，与本书所要探讨的中国翻译文学的范畴一致。

另外，以上对于（中国）翻译文学的界定都是以传统的纸质媒介为中心的。然而，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乃至全球的文化语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纸质媒介逐渐让位于电视、电影、网络等多媒体媒介，或是与多媒体媒介平分秋色。而且，由于视觉文化与网络文化的盛行，如今多媒体媒介甚至大有僭越传统纸质媒介的趋势。对于翻译文学而言，“网络文化”催生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网络翻译文学的出现，于是有了对这一新兴的翻译文学，即“网络翻译文学”的界定：“意指翻译文学网络化后或以网络为运作和传输的纽带而进行的文学翻译活动后带来的成果。这一定义中包含两个基本要素：一是翻译文学，二是网络化。依此我们可以区分两种不同的亚项：网络化的翻译文学文本和即时性的网络翻译文学。”所谓“网络化的翻译文学文本”是指传统的纸质翻译文学的网络化，即把传统的以纸张为媒介的翻译文学文本转化为电子文本，放在网络上，供读者阅读、欣赏或评价。网络化的翻译文学文本“加进了一些超文本（hyper-text）非相继性的链接因素，可提供百科全书式的阅读方式以及可任意卸载发送、复制编辑”；而即时性的网络翻译文学是指“通过电脑网络直接

^① 王向远：《翻译文学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 页。

进行翻译和书写而诞生的新的文学形式。它既包括那种以网络为主体，通过计算机软件直接生成的翻译文本，也包括那种以网络为手段和工具，而人工翻译或人工结合机译而生成的文本形式”^①。网络翻译文学的出现给传统的翻译文学概念带来了很大冲击，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拓展了翻译文学的概念和性质，因此在对翻译文学概念的讨论中必须要考虑到网络翻译文学这一新兴的翻译文学存在形态。本书对于（中国）翻译文学的探讨将以纸媒翻译文学为主。

本土文学，也称民族文学，是指以民族文学语言创作而成的，以反映本土文化内涵为主的精神财富。本土文学所承载的是本民族文化精神，内容上是本土读者所了解和熟悉的，形式上是本土读者所喜闻乐见的，是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文学作品。

本土文学与翻译文学虽然同属于文学范畴，使用看似相同的语言文字（实则有很大不同），共存于同一社会文化语境下，但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很多方面的不同。首先，本土文学和翻译文学的生成方式不同。本土文学是本土文学家的文学创作活动的成果，具有原创性，而翻译文学是由外国文学家创作而成，由本土文学家或翻译家（也包括外国文学家或翻译家）翻译而来的文学作品，属于“二次创作”；其次，本土文学和翻译文学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不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文学生存的重要前提和条件，是民族文学赖以立足世界的根本和源泉。本土文学承载的是民族本土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精神，翻译文学承载的是异域民族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精神。再次，本土文学和翻译文学采用的文学形式和文学风格不同，本土文学采用的是本土读者熟悉和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和文学风格，而翻译文学采用的是异域国家的读者熟悉和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和文学风格；最后，本土文学和翻译文学采用的文学语言也是不同的。本土文学是本土文学家用本民族语言创作而成的，是本民族读者熟悉和接受的、符合本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的、约定俗成了的文学表达方式和表达习惯。翻译文学采用的文学语

^① 张旭：《也谈网络翻译文学》，《中国比较文学》2002年第2期。

言虽然也是译入语民族的本土文学语言，但由于翻译文学毕竟不是原创文学，文学翻译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文学再创造的过程，是一个“创造性叛逆”的过程，所以翻译文学的语言自然而然地掺入了许多异域文化和语言的成分，特别是经由异化译法翻译而来的文学作品更是将异域的文法、词法、句法融合和渗透在民族语言表达中，形成了翻译文学使用本土文字，而非完全的、真正意义上的本土文学语言表达方式的独特的翻译文学语言形式。

可见，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有着许多不同之处，但二者又共存于同一社会文化语境之下，互相之间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互动交流。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独特而恒久的文学现象，无论是对原语文学和文化，还是中国本土的文学和文化，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究竟如何、互动方式是怎样的、相互的影响作用又表现在哪些方面等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探讨和研究，而这正是本书的研究初衷和主要研究内容。

第二节 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互动 关系的相关理论阐释

随着翻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西方一些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和理论学派开始从文化的角度探讨影响翻译和翻译文学的文化因素，例如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文化地位、政治文化等，进而对与翻译文学相关的本土文学，以及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都提出了重要的理论见解。“翻译的文学—文化学派”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支。

“翻译的文学—文化学派”包括两个有相似地理与文化背景的学派，即 70 年代发祥于低地国家（荷兰与比利时）的翻译研究学派和 70 年代末兴起于以色列的多元体系学派。翻译研究学派和多元体系学派都强调文化因素对翻译及文学的影响。这两派在诸如文学系统之间文化上的相互依赖

性、文本的能产性以及所有文本的文本间相互关联性质等方面为翻译研究以及随后的后现代文化理论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启示。这两派代表人物及其主要理论观点有：

“多元体系学派”：“多元系统理论”是由“多元体系学派”这个20世纪非常重要的翻译学派提出的重要理论，该派主要人物为伊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和图瑞（Gideon Toury）。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文化研究中心著名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系统地解释了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内的位置，以及翻译文学与译入语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内部的互动情况。“多元系统理论”的主要观点有：

一、“系统”概念的提出。“多元系统理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应视为系统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这些系统并非单一的系统，而是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系统；这些系统各有不同的行为，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任何多元系统，都是一个较大的多元系统，即整体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它又可能与其他文化中的对应系统共同组成一个“大多元系统”。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多元系统里面的现象，都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必须与整体文化甚至于世界文化这个人类社会中最大的多元系统中的现象联系起来研究。^① 文学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符号现象，自然也是一个佐哈尔所谓的多元系统，而且是一个由各种不同的因素按照一定的规则严格构建而成的动态的系统。“多元体系”意指各种文学体系的总称，涵盖了某一特定文化中从“高雅（high）”或“典范（canonized）”的文学形式（例如诗歌）到“通俗（low）”或“非典范（non-canonized）”的文学形式（例如儿童文学和通俗小说）。可以说，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涵盖了特定文化中从处于中心地位的典范文本到最边缘的非典范文本的各种文本类型。

二、翻译文学与本土原创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动态关系。佐哈尔的“多元体系理论”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要客观公正地认识、考

^① [以色列]伊塔马·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张南峰译，《中国翻译》2002年第4期。

察一个事物，就离不开与之异质的事物，“比方说，不把标准语放在各种非标准语的语境之中研究，就不能解释标准语；儿童文学不会被视为自成一类的现象，而会被认为与成人文学有关；翻译文学不会与原创文学割裂；大众化文学（如惊险小说、言情小说等等）不会被当作‘非文学’而弃之不顾，以回避承认它与‘个性化文学（Individual literature）’之间有互相依存的关系”。^①这样就自然而然地把翻译文学与本土原创文学联系在一起。

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作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两个子系统，时刻处在互动的动态关系中。佐哈尔认为翻译作品与多元体系的关系不能简单地分为或主或次，而是可变的，这取决于在文学系统内部运作的特定条件。佐哈尔勾勒了翻译文学在译语多元文化系统中占中心地位的三种情形。他认为有三种使翻译处于主要地位的社会条件，“第一，当一种文学还处于‘幼稚期’或处于建立过程中时；第二，当一种文学处于‘外围’状态或处于‘弱小’状态时；第三，当一种文学正经历某种‘危机’或转折时”。^②

三、翻译文学的地位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动态影响。佐哈尔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学文化地位决定了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或处于中心地位，起主要作用；或处于边缘地位，起次要作用。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又会影响到译者的翻译策略。当翻译文学在特定的多元系统内处于主要地位时，翻译文本与原文文本的界线是模糊的。为了将新的作品引入接受文化，译者往往会努力使自己的译文接近原文的形式，其结果是接受文化的原创文学和翻译文学均因此而“丰富”起来。而当翻译文学在特定的多元文化系统内处于次要地位时，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形。处于次要地位的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内构成了一个边缘系统，对目标文化中的主流文学规范难以形成重大的影响。翻译文本所遵循的是该文化既定的传统规范。在这种情况下，译者的翻译策略往往是保守的。根据多元系统

^① [以色列]伊塔马·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张南峰译，《中国翻译》2002年第4期。

^② 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

理论，如果某一文学多元系统十分强大，从而使翻译文学处于一个次要的地位，以这一多元系统为目标系统的译者往往会采取归化式译法，如果翻译文学在某一文学多元系统中处于主要地位，译者则多采取异化式译法。正如佐哈尔所说，“一个系统的行为模式，有时与它在多元系统中的位置有关。以翻译文学为例，它处于中心时，往往参与创造一级模式，不惜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处于边缘时，则常常套用本国文学中现成的二级模式。前者的翻译策略，着重译文的‘充分性’，后者则着重‘可接受性’”。^①

四、译语文化的需要对翻译文本选择的制约性。“多元系统理论”认为，“任何符号（多元）系统，例如语言、文学，都看作只不过是一个较大的多元系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们从属于后者，并与后者同构，因此与这个较大的整体以及整体内的其他组成部分有相互关系”。^②因而，文学与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文学的外部文化因素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

翻译研究学派：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霍姆斯（James Holmes）、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和巴斯奈特—麦圭尔（Susan Bassnett – McGuire）。该派重理论，强调历史回顾，采用文化译入研究手段，关注文学翻译的特点。近年来，该派更加重视考察译作与政治、历史、经济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勒菲弗尔借鉴了前人关于“意识形态”影响文学系统的观点，引进了“折射文本（refracted text）”这一概念，即为特定读者而专门处理过的文本，或者是为了适应某种诗学或意识形态而经过处理的文本。他还使用了“赞助行为（patronage）”这一术语，用来表示鼓励、宣扬，或者阻止、审查、破坏文学作品的各种有影响的社会势力。勒菲弗尔的“意识形态决定论”认为，意识形态决定了译者基本的翻译策略，也决定了他对原文中语言和“文化万象”有关的问题（属于原作者的事物、概

^① Itamar Even – Zohar,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Poetics Today*, Vol. 11, No. 1, pp. 45–51.

^② [以色列]伊塔马·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张南峰译，《中国翻译》2002年第4期。